

附录

2014 年理论学术研究观点要览

经济学篇

中国经济正面临着“新常态”

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创新

中国经济正面临着“新常态”，其突出表征为经济增长减速换挡，经济发展方式转向质量与效率型，产业链向高端迈进，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同步发生，中等收入群体成为稳定内需的主体，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中小企业和新业态成为增长新亮点。对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定位，不同的学者提出各自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中国适应经济“新常态”，最重要的是抓住时机，坚定不移地推进结构性改革，使我们经济的内在活力、经济增长的潜力进一步得以焕发，从而使中国经济在健康、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有的学者认为，新常态下必须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创新三项关键任务，发挥好中国经济的韧性、潜力和回旋空间。改革激发新活力，开放释放新推力，创新重塑新动力，三者相互关联、互为支撑，是实现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必然途径。

空间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并不对称

人的城市化才是新型城市化的核心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城市空间较改革开放之初扩大了两三倍，城镇化率也达到了 53.7%。但是，空间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并不对称，有些城市的快速扩张甚至带来了“城中村”和“城市贫民区”问题。如何评价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程度？如何实现真正的城市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有 2.6 亿农民工，户籍问题把他们挡在了享受城市化成果之外。如果挤掉水分的话，我国只有 36% 的城镇化率，离发达国家 70% 的城镇化率还有很大差距。有的学者指出，我国“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问题突出，一些地方盲目拉大城市框架，滥占耕地、乱设开发区，不断扩大城市面积，造成失地农民的数量大增，不仅危及国家的粮食安全，而且势必进一步加剧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中国城镇化还遭遇诸多困扰，对城市居民而言，“堵车、污染、内涝、房贵”等大城市困扰多多，对农民而言，“被上楼”、“半城市化”等问题也仍待解决。人的城市化才是新型城市化的核心。

收入分配改革有望真正破局

实现社会共享财富分配途径

收入分配改革已历经十余年时间,随着收入分配改革细则分批出台,人们关注收入改革如何在现实中落地。有的学者认为,初次分配环节的改革不仅要涉及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利益分配关系的调整,还要涉及劳资关系、劳工成本与就业问题,它必然要触动 30 多年来已经形成甚至相对固化的既有利益格局。过去十年来我国整个财富分配格局并非一成不变。GDP 这块蛋糕主要划分为三块,一块是资本所得,一块是劳动所得,一块是国家所得即税收。过去十多年,国家税收提升得比较快,劳动报酬提升方面相当滞后,不仅企业职工收入增长缓慢,而且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也已经多年未见调整,这就是大多数人感觉不到收入分配改革成效的原因所在。目前借助于反腐的势头,把高管薪酬改革再次提上议事日程,这个时机抓得是比较好的。对于收入分配改革如何推进,有的学者认为,首先要坚持利益分配适度均衡原则,其次是要积极稳妥推进,三是要打好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同步调整的组合拳。初次分配格局调整的关键在提低限高,再分配格局调整的关键在于用更大力度促进公平,第三次分配则要对慈善公益事业形成有力的激励机制,这是促进社会财富在自愿基础上实现社会共享的财富分配途径。

混合所有制并非中国所特有

发展混合所有制应分类实施

国企改革的重点集中在界定国企功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企业内部改革、完善监管体制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方面。对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论界争议较大,一些人认为这是否会迎来新一波“私有化”。有的学者认为,公有制和私有制相混合的混合所有制并非中国所特有,混合所有制是现代市场经济重要的企业产权组织形式,坚持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中,可以也应当借鉴。有学者认为,在以后一段时间内,将会出现混合所有制改制的高潮,出现民营经济组团与国有企业相融合的现象;国有企业将退出一部分竞争领域,转型升级到

产业链更高的层次去。也有的学者认为,当前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三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有利于实行政企分开;二是有利于激活国有资本活力,扩大国有资本的影响力;三是有利于企业走出国门,按国际规则开拓海外资源和产品市场。有的学者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应分类实施,以竞争与非竞争性作为分类的基本原则,将现在的国有企业分为公益、保障、竞争三类。在竞争领域,国家没有必要去经营实体企业,还要承担竞争风险。但国有资本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参股竞争性企业,从中获得的红利用于国计民生。在竞争领域,国有资本并不应该从所有竞争性领域完全退出。

(作者孙咏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社会学篇

八项规定减轻了社会治理压力

教育活动提升了社会整合能力

有学者指出,“八项规定”与“六项禁令”,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为官场立规。执政党的自我净化活动与普通百姓的热切愿望密切结合,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执政实效,规约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背景下的官员行为,也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社会治理的压力。作风建设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除进一步强化了八项规定与六项禁令实施的成果外,还通过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与奢靡之风的检视,进一步拉近了党员与群众的血肉联系,缓解了一度存在的官民矛盾,强化了人民群众的认同心理,使中国社会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保持了高度凝聚力。因此,人民群众才希望此项令人拍手称道的制度配置,会持之以恒地上下贯彻,而不要像一阵飓风那样。

城镇化与居住证制度有助于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对土地价值的关怀抑制了落户积极性

有学者指出,在土地价值日益升值的大背景下,农民进入城镇的观望心理上升了。虽然 2014 年放开了城镇、小城市与一些中等城市的入户限

制,但并没有多少农民工愿意就近就地“落户为城镇居民”,甚至于许多大学生上学也不愿转户口。虽然进城落户并不以上缴宅基地、承包地和集体土地收益分配权为前提,但农民工仍然以继续观望来回报当地政府的“改革红利”预期。到城镇与当地中小城市买房的农民增加了,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来回迁徙的“两栖人”增加了,到城市去消费的农民也增加了,这可能是城镇化的本质含义,而是否落户已并不重要。在大城市与特大城市高筑了落户篱笆的前提下,就业机会、教育资源与医疗资源的布局不均,是农村之推力与城市之拉力的主要动力生产机制。“推”“拉”力量的此消彼长,正在重新形成人口流动的新常态。居住证制度的实施,除在大城市与特大城市对部分流动人口具有吸引力外,在绝大多数中等城市是缺少制度配置力的。中国社会的迅速变化,使制度配置与制度需求之间的张力再一次拉开了。

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极低水平 “单独二胎”并未打开生育的“机会之窗”

有学者指出,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极低水平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为1.18。“六普”还发现北京市的总和生育率仅仅为0.70,上海市为0.74,整个东三省都在0.75左右。这就使原来广为流传的1.8的总和生育率水平不攻自破。从世界各国来看,1.18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属于“极低”范畴,比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要低。在这种情况下,“单独二胎”政策的放开,给整个社会以极大希望去打开生育的“机会之窗”。但截至目前,获批生育二孩的数量仅仅为62万人,与政策预期的200万相比,存在很大差距。这引起了学界与政府各部门的广泛热议。学者认为,生育率水平的持续走低,会进一步加速中国未来的老龄化进程。

政府投入的医保补助逐年提高 但个人负担额度依然没有降低

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经过多年推进之后,取得了重大进展。对此,一部分学者认

为,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解决了群众的“看病难”与“看病贵”问题。但另外一些学者则坚持认为“看病难”与“看病贵”问题仍然比较严重。在争论中发现,从2009年到2013年,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累计达30682亿元,年均增长24.4%。但政府投入的迅速增加却并未减轻个人的直接医疗负担。有学者认为,财政新增投入的大部分流向了医院、医生、药房和制药企业,但对患者的服务支出则相对较低。另外,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还存在“采购价格越高、获利越多”的药价虚高问题。所以,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的医疗体制改革,会继续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话题。

(作者张翼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

政治学篇

战略上谋划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的专业化和职业化

2014年,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国家治理”这一主题展开的。学者们对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了研究,比如“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等等。有学者认为,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体系,包括国家的行政体系、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

围绕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学者认为,必须发挥党和中央政府在治理体系中协调各方的作用,加强顶层设计,从战略上谋划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有学者提出,需要进一步放权和分权,让治理主体发挥更大作用,以民主责任制建设为方向完善治理结构,并健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负反馈调节机制,发展决策咨询系统健全协商民主,提高公共政策决策质量,通过培养职业政治家、职业文官、职业法官等推进国家治理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有学者认为国家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统一性、均等化和法治化。

总的来说,关于“国家治理”这一主题展开的研究基本上还是宏观性的,微观领域的具体研究相

对欠缺。政治学研究应当为解决现实的政治问题服务,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很多现实性的问题需要解决。

中国在政治实践中形成协商民主

中国的协商民主有五种主要形式

围绕协商民主的价值、内涵和实现形式,众多研究者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探讨。有学者比较了中国协商民主和西方协商民主产生的不同背景,在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是在反思选举民主理论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反思投票民主弊端的过程中产生的。在中国,协商民主却是在政治实践中形成的,不管是中央层面的政治协商会议或者是基层的民主恳谈,都是具体的政治实践。在中国的政治实践过程中,一直就有协商民主的传统,当然,实践中的这些协商民主既有成功的经验需要总结和推广,也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 and 解决。

有学者认为,协商民主就是一种决策和管理过程中的民主,协商民主强调公民要通过各种形式参与到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的过程当中,实现协商共治。在中国协商民主有五种主要形式:一是在社会基层层面,要建立起协商民主的制度,这样的制度在涉及公共利益的时候,有公民可以直接参与协商;二是在政协层面上有政党和界别的代表参与其中,他们去反映民意并进行对话协商;三是在政党层面上,各个党派的成员参与其中,通过自己党派出的代表,与执政党对话协商;四是在国家层面上,那就是人民代表,以及人民代表聘请的一些会外的民意人士,去和政党或政府的领导进行协商;五是互联网将成为协商民主的重要平台。

反腐败需要专业的具体制度设计

最好的制度要以法律的形式呈现

2014 年政治学研究还有一个热点话题就是反腐败,政治学研究主要围绕腐败产生的原因和如何防治腐败展开。学者们基本上认为,腐败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机制和制度不健全,当前反腐败的难题是难以对掌握权力的各级一把手实施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反腐败需要决心和勇气,更需要专业的反腐

败具体制度的设计和有效运行。有学者认为,最好的制度要以法律的形式呈现。中央一手继续保持反腐高压态势,一手要加快制度建设。加强反腐立法建设,加快权力公开、党务公开等相关方面立法进程,使权力依法行使、依法运行,形成“不能腐”的制度笼子。必须指出的是,2014 年反腐败的实践比反腐败的研究更为成效显著、引人瞩目。在过去的一年,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巨大进展,积累了丰富经验,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也向世人展示了打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

(作者张宁为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

哲学篇

维护和扩大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

重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权是当代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有学者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的弱化,既是因为西方学术思潮的强大,也和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把握不当有关。西方消解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的主要方式是制造意识形态和学术的割裂,用“细小叙事”消解“宏大叙事”,用个人生存意义的“生活界”否定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历史客观规律。这就意味着,只有超越西方学术思想,才能在引领学术发展上获得一席之地。维护和扩大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必须对现有学科进行前提性批判,确定学科研究对象;确立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判断的客观坐标,建立相应的核心学术话语;把价值评价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确立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学术评价标准。

从学术视角分析当前意识形态乱象

强调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有学者指出,西方意识形态向我国的渗透已

经从思想观点层面演化为具体的理论和学说,集中表现为经济领域的“私有制优越论”,政治领域的“告别革命论”“国际接轨论”“政治多元论”,思想文化领域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意识形态多元论”“主流意识形态消解论”,社会领域的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等。有学者提出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些新动向:恶意炒作我国思想领域热点话题,否定我国基本制度;蓄意歪曲中国梦的精神实质,间隙公民情感和国家精神;炮制社会事件质疑责难国家治理,企图削弱国家统治合法性;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我国民族凝聚力,搅乱当前安定有序的发展环境。学者们指出,当前的意识形态乱象,同西方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渗透具有相当的隐蔽性有密切关系,但归根到底是由于一些地方、部门和领域,对于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思潮没有理直气壮地斗争,对于媒体失之于管理导致的。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

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不做西方学术的“传声筒”“留声机”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这句话引起了个别学者的曲解和误读,认为它蕴含的精神就是要搞“宪政”。对此,有学者明确指出,经过西方学者的反复阐释和演绎,“宪政”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意识形态色彩十分鲜明、具有特定含义的名词,人们一提到“宪政”这个词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跟着西方观点走,很容易落入西方的意识形态话语陷阱,因此还是不用为好。学者们指出,鼓吹“宪政”、乃至故意歪曲党的领导与法治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要用西方的法治理念和法治模式否定我国宪法及其确立的制度和原则,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在民主法治建设问题上,必须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保持政治定力,对于西方好的东西要积极吸收借鉴,但决不能照抄照搬,做西方学术的“传声筒”“留声机”。

全球化和社会主义是辩证关系

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复兴和发展

如何认识全球化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实际上意味着“世界上的工人们相互竞争”,甚至是“彼此斗争”;要抵制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需要实现工人阶级全球化和马克思主义全球化。有学者认为,二战后形成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是全球化的一种社会主义模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竞争同时也是两种全球化类型的竞争。有学者提出,全球化和社会主义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都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出现并成熟起来的;直到20世纪初期社会才发展到允许二者变成现实的可能性;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所依据的就是社会主义是一个全球化的制度,向这个全球化制度进行的跳跃即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性。

(作者李建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伦理学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走向实施

传统道德研究升华并放眼世界

2013年底,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2014年,学者们研究的重点由前期规范论证转向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施途径的研究。这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各民族的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城市治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精神文明建设等等。

2014年9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讲话中提出:“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这将传统道德问题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中国传统道德延续至今,其

价值不言而喻,因而需要我们“直面道德传统”。另一方面,正如儒学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传统道德的价值更体现在它对解决世界问题的意义。

微时代特别需要培育虚拟自我的网络伦理意识

网络社会不是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虚幻天国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使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深度交融,互联网正在成为悄无声息影响经济政治社会的重要力量,身在“网”中的人们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也不断突破现实和传统中的伦理范畴,新的伦理问题出现。大数据时代、自媒体的盛行给人们带来了空前的便利,但同时带来了隐私被侵犯等网络问题。有学者强调,微时代特别需要培育虚拟自我的网络伦理意识。也有学者指出,网络虽然有其特殊性,但网络社会不是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虚幻天国,本质上它是现实社会的延伸,是延伸了的现实社会。网络问题的解决需要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法律和道德、个人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超越对立思维构建生态文明价值观

城市应让我们诗意栖居和留住乡愁

2014年生态文明领域研究成果众多。除了引进西方学术界观点、挖掘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之外,在基础研究方面,有学者提出生态文明价值观的构建必须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对立;应当包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幸福和环境正义三个方面。就现实实践而言,有学者从探讨生态文明建设与人的日常生活的关系入手,研究如何构建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态文明,城市如何能够让我们诗意栖居和留住乡愁。

(作者郭清香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党史学篇

重要党史人物仍是研究富矿

2013年12月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由此引

发的毛泽东研究的一个新高潮一直延续到2014年。有学者以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研究的一些论著为例,对毛泽东研究中的随意性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指出只有占有可信的资料,论断有据,全面、准确运用、解读史料,才能避免主观随意性,才能写出信史。2014年是“三线”建设战略决策作出50周年。有学者考察了以毛泽东为核心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三线建设战略决策来龙去脉,认为这个战略决策基本正确,很有战略眼光,其历史和现实意义已为实践所证明,失误也必须引以为鉴。

2014年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邓小平文集》(1949—1974)、《邓小平传》(1904—1974)等著作,披露了一些新史料,对推动深化邓小平研究意义重大。有学者对邓小平晚年的思想进行了研究,指出邓小平强调要理直气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指出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等,对现实具有重大指导意义。2014年也是任弼时诞辰110周年。有学者考察了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在中共中央决策层的工作和贡献,指出任弼时以敏锐的洞察力、坚定的原则精神、细致周密的观察和思考,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于王明的研究,有新的重要进展。郭德宏编的《王明年谱》,充分吸收了20多年来国内外出版、发表的有关论著的成果,披露了大量一手材料,对许多问题提供了新看法,如:关于顾顺章叛变的问题,关于向忠发被捕的细节问题,关于王明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问题,关于王明两次中毒的问题等。《王明年谱》在充分呈现王明“错误一生”的同时,并没有因此而忽略王明的一些正确立场、观点和行为。

党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受到关注

有学者从传统学术流变的角度,来分析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中国人为什么接受了社会主义学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诸多健将借助西学的阐释,通过尊墨抑儒、以墨攻儒,墨学压倒儒学,成为当时的时代潮流。由于墨学反映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阶

级的利益,主张人人平等,勇于使用暴力反抗压迫,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能够与西方社会主义学说对接的传统学术流派,尊墨抑儒这种传统学术上的巨变为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学说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使得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立足与发展具备了文化上的可行性。有学者通过梳理认为,党对待传统文化,从革命思维和行为下的激烈否定、基本否定,到执政思维和行为下的理性看待,再到新世纪的高度评价,既反映了时代主题的变换,也反映了党思想认识的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有了新结论

有学者指出,学界对“中国化”起点之所以产生分歧,主要原因在于对“中国化”标准缺乏共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具备四项条件:理论传播、中共创立、实践活动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形态。中共二大具备了这四项条件,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有学者也指出,中共二大是党关于群众问题认识的第一次飞跃。中共二大建设“群众党”的探索,不仅实现了中共的生存和壮大,更实现了对于社会底层的多数人的发动和解放,对群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奠基性意义。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创建有新解读

1925年秋创办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曾经为中共与国民党培养了一大批重要的政治干部和军事人才,在中苏两国关系史、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史、国共两党关系史以及中国革命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然而,有关这所学校创建主体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似是而非,甚至彼此对立的解读。有学者指出,在苏联经济状况比较困难,人民生活比较困苦的情况下,俄共(布)和苏联政府仍然提供了巨额资金和大量人力、物力创建莫斯科中山大学,反映了其国际主义精神。

革命时期的学生运动有新见解

有学者考察了“五四”到“五卅”期间的学生运动,认为学生运动高涨本身就是国家权威缺失的一种表现,同时社会各界对学生运动亦经历了一个由

同情、支持到反对、利用、支持等多重态度兼而有之的发展过程。有学者认为,一二·九运动既是一场政治性质的运动,也具有思想运动的特质。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一二·九运动内在的思想动力,但占主导地位的还是马克思主义。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战线主张的理解与运用以及学生自我身份认同的调整是影响一二·九运动内容与走向的重要思想因素。

红军长征的原因有了新说法

有学者指出,红军长征的原因,是党这一时期革命模式选择的必然结果,即革命动员与土地革命模式的选择,产生了“打土豪”经济,最后出现了过度动员与苏区经济危机问题,决定了在1934—1935年之际的失败。有学者指出,苏区内部大规模肃反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内部因素之一,国民党围剿方法的调整则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外部原因之一。有学者对红军长征的进程做了研究,指出中央红军在贵州的四个多月特别重要。在当时极端复杂而险恶的环境中,中央红军面对众多不确定因素之所以能突破国民党军重围,从被动转入主动,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坚持从实际出发,果断灵活调整行进方向;二是强大的精神力量。

关于党的两个历史决议的研究更加深入

有学者对1945年和1981年党的两个历史决议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关系作了探讨,指出两个历史决议及其形成过程,完善了中共党史研究的思想原则,规范了党史研究的学术准则,提供了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两个历史决议都来之不易,都是付出沉重代价之后,集中全党智慧制定出来的,必须加倍珍惜。有学者对起草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思想史料进行了整理和研究,为廓清起草历史决议的思想发展史的脉络,还历史本源作了较全面的梳理。

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党史研究成学术生长点

对于如何深化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党史学者作了诸多尝试和探索。有学者提议用“新革命史”范式提升党史研究,有学者认为有必要探究中共党史研究新视觉和表述体系,有学者支持党史专家张静如提出的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思想,这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成就最大。学者们尤以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6)这一社会转型时期为研究的着力点,围绕旧城改造、城市民主改革运动、私立学校的接管改造、政治语言的传播与习得、统购统销等出现了一批研究新成果。比如,北京辅仁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正式接办的第一所教会大学。针对辅仁大学事件是新中国“轰轰烈烈的收回接受外国津贴学校运动”的起点的说法,有学者指出,事实并非如此,辅仁大学事件不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对教会大学的政策出现变化的结果,而是教会撤资后政府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北平解放后,辅仁大学的天主教办学精神逐渐褪去。为维系辅仁的天主教办学精神,教会方面选择以停止提供办学经费向学校和政府施压,最终酿成事端。

(作者分别为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李庆刚、硕士研究生李攀)

法学篇

什么样的中国是“法治中国”

“法治中国”是2014年的热词。为了深化对于法治中国的认知,2014年《人民论坛》《江西社会科学》等刊物都组织了关于法治中国的专题研讨,多名学者参与其中。有学者认为,法治中国的基本要求和标志可以概括为8个要点:(1)人大民主科学立法,(2)执政党依法依宪执政,(3)政府依法行政,(4)社会依法治理,(5)法院依法独立公正司法,(6)法律监督体系完善,(7)法律服务机制健全,(8)法治文化繁荣昌盛。这8个要点涉及法治中国的各个方面。有学者提出,法治中国是一个整

体性的战略构想,既包括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的价值追求,也包括不同层次的法治建设实践;既包括良善法治制度的历时性积累,也包括全面建设法治目标的战略构想。法治中国建设是价值目标、制度结构和基本进路在实践中有机统一的整体安排。

法治积极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最近一两年的政治主题。2014年,法学界对这个主题进行了全面的回应。有学者认为,法治对于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既可以提供正当性的支撑,也可以满足国家治理对于有效性的需要。有学者研究了司法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认为司法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司法作为微观社会矛盾纠纷的灵敏显示器和社会治理状态的预警机,为法治的发展提供了反思机制,可以发挥制度变革的“微调器”功能。有学者从行政法的角度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行回应,认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发挥政府管理、市场机制和社会自治各自的作用,行政法的任务应从控制政府权力转向限制政府权力。还有学者认为,应当从善治的角度研究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努力打造一个民主的、法治的、公正的、廉洁的、高效的国家治理体系。

应当强调法治之下的改革

对于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有学者侧重于研究改革之变,认为改革涉及社会公众,是顶层设计,是目标;法治指向法律的实施,是底线。有学者强调法治之基,认为改革中的法治是动态的、变迁的法治。深化改革,意味着改变规则和治理方式,而整个政治共同体要负担由此产生的法治成本。让法治为改革的有序展开及合法性提供基础,让法治巩固改革的成果;同时,也让改革促进法律的完善。还有学者认为,“法治改革”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用“法制改革”或“法律改革”更为妥当。另有学者强调法治包括了不能改变的若干特征:首先,法治意味着规则之治,与人治和自由裁量相对应;其次,法治意味着良法之治,良法的判断只能适用价值评价标

准,因此要承认和尊重不同的法治模式;最后,法治要求法律的平等实施,即尊重主体平等、空间平等和时间平等。

“法治体系”建设成为一个新的目标

在以前的权威文件与法学理论中,一般强调法律体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法治体系建设成为一个新的目标。法治体系主要包括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等内容。针对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有学者通过阐述“治理”一词,描绘出国家治理体系的应有之义,进而得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与保障系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一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法治体系的基本框架,这个框架包括:(1)依法执政是法治体系的核心与灵魂,(2)法律体系是法治体系的前提和基础,(3)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法治体系运行的途径与机制,(4)司法制度是法治体系的重要载体和保障。有学者在法治体系的框架下,专门论述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基本理论,阐述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

宪法实施还需要政治力学

2014年是我国“五四宪法”颁布60周年的纪念年,关于“五四宪法”的回顾与反思引起了法学界的重视。与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宪法实施、宪法监督同步出现的,是法学界对于宪法实施的高度关注。有学者从宪法和一般法律的差异着眼,探讨了宪法实施的特殊性,认为,一般法律是约束个体的,虽然法律最终还是为了保障每个人都有合适的自由,但是,绝大多数一般法律都是以公民义务的形式体现出来,公民一旦违反了法律义务,法律是要追究的。相比之下,宪法的目的和形式都是保障人民权利。

正是由于宪法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民权利,所以要把实施宪法的一部分职能交给人民。有学者认为,在我国的宪法文本中,有32个条款还需要进

一步实施,还需要加强实施。对于这种观点,另有学者认为,各个宪法条款的实施状况如何,应当有更具体的判断标准,应当进一步探索宪法实施的政治力学。

司法改革问题上出现了若干新观点

2014年的法学研究中,在司法改革的问题上出现了若干新的观点。有学者质疑法官绩效考核制度,认为该制度背后的“规训逻辑”与司法规律形成了尖锐的冲突,对法官的实质理性构成了严重的伤害。因而,现有的法官绩效考核制度并不成功。如果有效地解决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的问题,必须另辟蹊径,寻找法官管理的新形式,应该建立一种以程序约束为中心的法官管理和培养模式。还有学者对司法独立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不能把“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当做一个孤立的事物,不能只看到“人民法院”及其“独立审判”,相反,要看到人民法院永远都是政权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就相当于一个零部件在一个机械系统中按照自己的轨道、频率、方向独立地运转。

(作者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喻中)

文化学篇

好的文艺作品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习近平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有学者指出,有一段时间我们很重视文艺作品的市场化,过于急功近利导致出现一些偏差,目前文艺工作发展需要把文艺自身的追求和市场结合更好。文艺创作者是文化的推动者、传播者,在创作之前,不能就从媚俗和迎合市场的角度考虑,而应考虑创作市场化运作之后带来的社会影响,文艺作品涉及对未来一代人和大众的精神影响,要有一种价值观的自我认识。

学者认为,文艺的贡献主要有两个功能,一个

是提升人民的精神需求,二是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其中,精英文化偏向提升需求,大众文化偏向满足需求。文艺创作不是孤芳自赏,要面向社会,面向读者,提升受众的精神层次,满足受众的精神需求。从市场的角度看,市场很容易偏向满足当下的感官需求,这种需求的娱乐性比较强,购买冲动更强,却往往把握不住分寸。目前市场上缺乏有追求、雅俗共赏的作品。

互联网文化产业发展速度超出了想象

2014年研究显示,中国文化产业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整体看,整个中国的产业都发生着巨大变化。有学者指出,从数字电视到视频、体育、娱乐宝,预计在明年上半年,中国移动互联网将会取代PC网,成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在这个背景下,传统文化产业正在搬到互联网上。根据测算,到2015年底,互联网文化产业的市场价值将占到文化产业的70%左右。体验类的文化产品,包括电影演出等,大概占10%,并且还有成长空间。传统文化产业,传统媒体和工艺美术等等,预计占20%。这是按照目前对互联网企业市场价值的评估得出的判断。

文化产业跨界融合成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

今年,政府对文化传媒产业政策的一个重要方向,是促进文化产业和其他行业的融合发展,也就是跨界融合或跨行业的融合。具体来讲,跨界融合指在服务业各个领域里尽可能促进融合,然后再用创业设计提升和改造传统制造产品,也就是加强服务业生产线,这是中国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一个核心方向。

为什么说跨界融合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核心方向?学者指出,凡是高端的产业,都包含很多创意设计。中国产业要提升,一方面要加强服务业,服务业中文化产业市场空间会大一些;另一方面,所有产业都要有创意,从餐饮一直到各种包装、消费品、日常用品等,都是可以通过与文化创意设计的融合来得到提升。学者认为,现在文化传媒产业跨界融合一般需要产业发展到很高的水平才可能实

现,目前中国也在走跨界融合的路子,但速度依然较慢。

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具有标志性意义

今年下半年,北京等地设立知识产权法院,这具有标志性意义。知识产权法院是法院的一种,其裁判的案件都是知识产权案件,包括专利、商标、版权、域名,以及不能归到其他类别的反垄断案件。学者指出,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重要意义,有三个方面。其一就是确保知识产权裁判的一致性,只有法律裁判的一致性,才能确保程序正义和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其二是明确了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有利于提升人们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其三是提供了专业化的知识产权案件处理的法律机构,逐渐提高知识产权领域的专业司法水平。十八届四中全会在依法治国方面的指导思想逐渐落实到文化领域,会对保护知识产权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作者为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

新闻与传播学篇

新媒体以其强烈的替代性依存理念影响着当下社会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新生力量急速发展的同时正改变着当下中国社会格局,亦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现实社会的媒介文化。学者认为,网络时代传播方式已然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从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分众传播、交互传播、沉浸传播的发展过程推动了传播学理论的思考与创新。不仅如此,互联网等新技术变革支撑的传播实践,正在改变当前人类社会的基本逻辑,各种领域的社会关系进入一个持续的重塑过程。科技的发展使民众不只是信息的消费者,相反,在一些突发性事件中普通民众可以把自己的所见、所想以最简短、快捷的方式传递给他人,网络民意由此走进现实,呈现出对现实的干预能力。学者认为,在此背景下,完全依附于传统媒体报道的时代已然褪色,新媒体以其强烈的替代性依存理念

影响着当下社会。当下的网络化社会,是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而不是以往媒介功能的扩大。

报网互动、媒体融合指向的都是新工具

媒体融合与报网互动成为业界讨论的热点。学者认为,媒体的核心任务是提供信息,无论是报纸、广播、电视,还是网站、APP、微博、微信、户外LED屏,都只是工具。其实,报网互动也好,媒体融合也好,指向的都是新工具。学者认为,当前,除了资本运营外,媒体融合的主要工具就是建设和运营网站、APP、微博、微信。有的传统媒体在这方面表现不凡,粉丝众多,影响力甚至超越了纸媒本身。然而,这样的转型是不是一条成功的路子?未来的媒体形态是否就是如此?目前下结论为时尚早。市场瞬息万变,工具更迭的速度也令人眼花缭乱,如果跟风走、片面追求工具,很容易耽搁了作为媒体本质的内容信息。在人人都是媒体、每个媒体都需要内容的现实之下,传统媒体应该有理由、有信心输出升级版内容——当然,不是通常意义的一篇新闻报道,而是业内人士所说的“内容产品化,产品服务化”。

网络规范和治理机制亟须跟进

网络的低门槛、低成本以及相对自由等特征赋予了每一位公民传播的权利。然而,新媒体的传播内容不仅给公众塑造了一个新的公共意识空间,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变着公众的认知。因此,网络规范和治理机制也要跟上。学者指出,面对信息源不确定、社会性媒介自内容失衡、内容产权置空、内容价值链断裂以及内容转移风险等隐患,都需要建构新媒体内容治理机制等相关应对措施。

有学者认为,正确对待新闻源主体对新闻事业的发展极其重要,即在积极汲取活跃的新闻源主体传播资源的同时,亦需要正确定位活跃的新闻源主体的社会角色。事实上,活跃的新闻源主体更类似于当下的网络舆论领袖,他们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他们既是普通民众的“发声人”,更是民众意向的“引导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能扮演着网络事件的“挑衅者”,而这恰恰需要网络制度或规则及时出台予以约束。

(作者为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李春雷)

来源:北京日报 2014年12月29日

2014 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

热点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

入选理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一直是近几年来学术界关注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2014 年的研讨主要聚焦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上,相关的研究大致从以下几方面展开: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解析,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对“三个倡导”具体内容的解读,尤其注重其与传统价值观念和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关系的辨析。2.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主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国梦提供价值支撑;引领社会思潮,支配整个社会领域的各种价值规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精神保障等。3.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和机制,主要包括宣传引导,特别强调弘扬传统文化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意义;制度建设,强调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渗透到各行各业的规章制度中去;个体教育,特别强调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探索新媒体教育手段的运用,和符合青少年思维方式的教学方法。

● 专家点评

2014 年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发表了许多有分量有影响的科研成果,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还处于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的阶段,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学界应充分发挥多学科交叉研究优势,坚持理论与实践、传统与现实相

结合,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客观需求,深入挖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蕴涵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积极借鉴国外优秀文明成果,科学揭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本质诉求,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提供基本遵循和具体要求。这是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课题。

(点评人:吴潜涛,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热点 2. 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入选理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改革的总目标,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重大部署。2014 年,围绕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的学术探讨与研究成为热点,学者们发表了大量文章,其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层面:1.对“治理”理论的学术史梳理和内涵解读,强调治理主体上的多元参与,治理机制的法治化,治理理念的理性化,治理对象的公共性等。2.关于“国家治理”的内涵,对此学术研究有不同的侧重,一种强调社会的作用即社会自主性的治理;一种强调国家的作用即国家主导下的治理;更多学者指出,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说到底是国家主导下的国家与社会的协商与合作。3.国家治理现代化包括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方面内容。前者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后者指制度执行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有机整体。4.依法治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保障:强调依法治国就是要实现依法执

政、依法行政、公民有序参与立法、建设法治文化;研究依法治国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的辩证统一关系;突出“依宪治国”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作用。

● 专家点评

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深度关注。一方面,依法治国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依法治国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法学领域的问题,更是一个政治学领域的问题,也是经济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等其他相关学科需要给予高度关注的问题。在当下以及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与依法治国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法治与人治、法治与德治、民主与法治等等,都有可能形成一些新的研究热点。

(点评人:桑玉成,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教授。)

热点 3. 儒家思想的政治哲学解读

入选理由:儒家传统对今日中国之制度设计有哪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对儒家思想的政治哲学解读成为 2014 年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儒家政治哲学的构建,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儒家政治哲学的特质、使命、概念和方法等主题展开。2.对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阐释,对儒家政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的互动以及“民为邦本”“为政以德”“尊贤任能”“廉政勤政”等理念进行了深入探讨。3.对儒家经典进行政治哲学的诠释,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尚书》《春秋》等经典文本中的政治思想进行深度挖掘。4.对历代思想家的学说、观点进行政治哲学的解析,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二程、朱熹等人政治思想的关注和评析。5.对儒家思想与理想政治形态及社会治理关系的探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儒家王道政治理想的现代意义、儒家思想与国际秩序的构建

关系上。

● 专家点评

当前,挖掘儒家思想理论的创新成果与面对当代问题的实际需要相比,显得非常不足和薄弱,尤其是在儒家基本义理和社会科学及社会政策结合方面。这有待于学术界持续不懈地努力。儒家政治哲学研究的开展,在儒家思想理论创新方面带了好头,但仍需要在中国政治哲学史的开掘和当代儒家政治哲学理论建构两方面做更多的研究投入。期待儒家政治哲学的研究为解决当代广义社会政治领域的问题提供更多的历史与哲学智慧。

(点评人:彭永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热点 4. 微时代的文化传播与话语表达

入选理由:随着互联网和移动技术的发展,我们进入了一个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双向互动的微时代。传播方式的变革促发了人的生活方式、审美趣味、精神状况等的转型,其后果与走向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层面,尤其是以“微”为特色的文化传播和话语表达。1.对表征微时代特征的碎片化生活方式和“微文化”进行归纳与阐释。学者们普遍认为,基于互联网文化的微时代,人们的交往、工作、娱乐都呈现出有碎片化状态的趋势,也呈现出跨阶层、跨地域、跨平台等特征,而网络时代的快节奏和即时性酝酿了“微文化”的产生,文化产品和文化消费变得便捷、多样化。2.关注微时代的文化传播和话语表达机制。有学者从作为微文化载体的机器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变革以及网络文化的生产来探讨微时代文化传播的逻辑,指出多元话语和差异表达开始越来越多地占据公共文化空间,而媒介话语表达机制也正在走向“微主体化”“无地方化”和“强社交化”。3.反思微时代文化传播和话语表达背后的精神与社会问题。学者们在看到微文化积极的一面的同时,也指出其喧嚣浮躁、疏离虚无、自

我怀疑乃至自我消解的时代症候,需要人们对此种文化现象保持一份警惕。

● 专家点评

今天,“微”已经成为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关键词。以移动互联网为技术基础的新传播方式,即微传播,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同时也带来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一系列新课题。因此,这个选题不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也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对它的思考和深入研究也有助于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是一个接地气的、扎根于现实生活的真正的前沿问题。

(点评人: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热点 5. 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国家发展战略转型

入选理由:2014年,虽然世界经济走出了经济危机,但增长乏力,不平衡没有消除,产业创新仍待探索。从中国自身发展进程而言,自从2012年GDP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由大求强的战略目标历史地提上了议程,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成为核心主题。学界对新常态的研究涵盖了多方面的主题,包括如何看待增长率的下降,如何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增长模式,如何实现国民经济三次产业的结构升级,如何提高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拉动作用,如何使投资在增长中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如何培育新的比较优势继续发挥出口对增长的支撑作用,如何形成产业组织新特征,如何使经济增长从依靠要素成本优势转向依靠人力资本质量与技术进步,如何形成统一透明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如何推动低碳型发展方式,如何化解因增长率下降而显现的各种潜在风险,如何从刺激性政策调控转变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和更科学的宏观调控,等等。这些主题构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研究的丰富内涵。

● 专家点评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以新常态思维探索发展转型的主题是必要的。在2014年11月北京APEC会议上,习近平同志系统论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增长、新结构、新动力与新风险。在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又全面分析了新常态的九大特征,并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认识国内外经济新常态历史性变化的内涵,形成适应新常态发展所需要的战略与政策,并在新常态发展中赢得主动,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中心议题。

(点评人:张幼文,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热点 6. 中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入选理由: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用“社会治理”来代替“社会管理”(“社会管理”的提法从十六大报告开始至十八大报告一直沿用),仅一字之差,却具有重大意义。与社会管理相比,社会治理更强调主体多元、关系平等、方式灵活以及手段综合。中国的社会治理创新有别于西方,具有自身的理论特质和实践模式。当前,社会开放性所带来的全球风险、社会危机以及新型社会治理力量的兴起,迫切需要中国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予以回应。对“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理论意涵、现实路径进行深入探讨,将有助于充分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正、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和谐。2014年有关“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研究情况大致如下:1.从中国治理文化的特殊性、治理情境的复杂性以及治理内容的内生性等维度,揭示中国社会治理的本土特质。2.对社会治理方式、制度、体系的宏观论述。涉及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主体关系及能力、关键环节、核心议题、基本依据、实践路径等方面,深刻剖析了“一主多元”“社会协同”“源头治理”“依法治理”“基层自治”“社会共治”“服务型政府建设”等社会治理方式的有效性和基本路径。3.将社会治

理的思维应用于相对微观的领域和实际操作层面,发掘在网络社会、城市/农村社区、社会工作实务、企业劳动关系、突发公共事件等具体情境中,社会治理理念的实现机制,以及其中蕴含的新特点、新价值,使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理论更加深入和丰富。

● 专家点评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也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重要节点。鉴于此,各个学科都从其独特的视角关注、解读和研究中国式社会治理理论体系及其应用价值。面对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新形势,社会学学界则以社会学的话语体系,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重点论述了创新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作用。不过,迄今,中国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下一步有待于拓展和深入研究的命题还很多,包括提升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与依法治国的内在关系研究;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的理论基础、基本内容与现实路径研究;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法治化中的定位与作用研究;等等。

(点评人:陆杰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热点 7. 甲午战争与东亚历史进程

入选理由: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对中国和东亚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研究甲午战争,有利于深入了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变革,也有利于明晰日本历史的转折和东亚历史进程的演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目前研究情况大致如下:1.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形势研究。学者们分析了甲午战争爆发时的世界局势,中国国内政治体制落后,中国和藩属国朝贡体系的变化,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和战略战备计划等形势,论证了甲午战争爆发的必然性,驳斥了甲午战争突发论。2.甲午战争军事情况研究。涉及甲午战争中中日军事力量、战略、战术

的比较,清朝陆海军的评价,甲午战争的情报问题。总结了甲午战争失败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原因。3.甲午战争对中国的影响。学者们着重分析了甲午战争对近代中国国力、政治体制、经济形势、思想文化等的冲击和长远影响。面对新形势,总结战争经验、吸取教训尤为重要,诸如发展国力、杜绝腐败、实现强国梦想,避免战争,减少战争带来的人类灾难等等,学者们进行了不同的思考。4.甲午战争对东亚历史进程的影响。甲午战争使中朝宗藩关系终结,日本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空前膨胀,心理基础、意识形态、对世界的认识发生重大改变,欧美和日本等在华势力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日俄争夺朝鲜,中朝两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 专家点评

1894年日本挑起的中日甲午战争,对中国以及东亚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的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开始的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进一步加深。战争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正是以甲午战争为契机,孙中山发起成立“兴中会”,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了戊戌变法运动。从此,中国人民的救亡图存、谋求民族复兴的伟大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与此同时,日本借助甲午战争的胜利,尤其是向中国掠夺的巨额赔款,迅速走向了向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并取代西方殖民者成为中国和东亚各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铭记历史,才能面向未来,更加珍惜世界和平。

(点评人:郑大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热点 8. 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服务体系优化

入选理由:在养老保障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主要以资金制度为研究对象,而对服务机制探讨不够充分。在当前养老保障资金制度建设已取得较大进展的同时,如何在老龄化背景下,

通过优化养老服务体系来增强养老资源的可及性成为学界的重要议题。研究议题主要包括:1.澄清对养老服务的认识误区。基于实地调研,学者们主要澄清了“将居家养老等同于家庭养老”“将社区养老等同于机构养老”“将机构养老等同于市场化养老”等误区;2.考察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国际经验和教训。重点总结了美国、英国、德国、瑞典、荷兰、加拿大等国家养老服务构建的经验与教训。3.完善养老服务结构体系。重点探讨了三类养老服务方式的功能定位、互动配合、协同推进等内容。4.优化养老服务责任体系。以传统“孝道”文化为基础,着眼于政府、社会、国民个人等主体在养老服务体系改革与发展中的责任分割,具体勾勒了政府财政、社会组织、民间资本、家庭与个人的责任内容、承责路径和方式。

● 专家点评

老龄化形势严峻,养老服务需求巨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任务紧迫而繁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界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集中且深入地研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及其优化,硕果累累,成绩斐然;而且其中的不少研究成果已经在养老服务的实践中得到转化。当然,这一研究还有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空间。特别是需要开阔视野,将养老服务放到更广阔的背景予以研究。如联系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探究资金与服务的关系,在全面深化改革大潮中研究有助于养老服务发展的配套政策和多部门合力机制,借助互联网、物联网的迅猛发展来建设并优化养老服务网络体系,按照依法治国的理念明晰养老服务责任体系,等等。我们期待着养老服务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齐头并进、相得益彰。

(点评人:童星,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热点9.教育综合改革背景下招生考试制度的理性探究

入选理由:以高考和中考为代表的学校招生考

试制度,不仅关涉社会公正和教育公平,而且对基础教育各阶段的教育质量、对社会人才选拔和个体成长产生极大影响,因而既是受公众持续关注和社会热点,又是学界十分重视的教育理论、教育实践与教育政策研究的学术交汇点。学者们基于以往与实践变革和理论探究,在2014年聚焦如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究:1.在继续探讨招生考试制度之社会功能的同时,更加强调招考制度改革的育人价值,更加关注其对学生成长、人才培养和选拔的导向与激励。除了强调国家的政策性推动外,还强调高校招生考试的自主权和学生的自主选择。依此破解招考难题,才能更好地将万千学子争过的“独木桥”变成合理选拔人才、促进学生学习、维护公平公正的“立交桥”。2.反思自主招生与异地高考政策,借鉴历史经验和国外人才选拔方式,提出高校要引入多元化的评价、选拔和录取机制,实现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大学招生录取与综合素质评价的“三位一体”,并建构理论模型为政策实践提供有效路径。3.针对生源渠道差异(尤其是基础教育质量差异)和名额分配制度(如分省定额制)等的利弊及其原因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学者们提出了严控部属高校属地招生计划比例,提高中西部和人口大省的录取率,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的人数,或在遵循国家利益最大化、兼顾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以及生源多样化等原则的基础上,采取分层调控的办法。4.针对考试科目能否选择、考试能否一年多次、文理是否分科、是否加大高校自主招生比例、是否减少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等具体问题展开学理探索。

● 专家点评

作为连接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关键环节,人们常用“牵一发而动全身”来形容高考改革的敏感和复杂。以高考为核心的考试招生制度,对提升文化教育水准、维护教育公平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具有重要的作用,其改革不仅一直是教育界关注的热点,而且经常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2014年9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

改革的实施意见》,更是有充分理由将招生考试制度改革作为2014年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之一。这次改革是恢复高考37年来最全面最系统的改革,是教育综合改革中最重要最复杂的改革。对于高考这么一项影响重大、万众瞩目的重要制度,2014年是一个转折点,以往新闻报道多、理论研究相对较少,一般议论多、深入分析相对较少,零星探讨多、系统研究相对较少这种“三多三少”的局面开始改变。

(点评人:刘海峰,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教授。)

热点 10. 边疆民族问题研究

入选理由:边疆民族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关系到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与中国区域政治地位发展的变化,边疆民族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热点,在学术界也引起广泛争论。关于边疆民族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理论层面深刻阐述了边疆、民族、民族关系等基本概念的内涵,在此基础上探索性地提出了很多新的知识范式与理论模式,为国家解决边疆民族问题提供智力支持;2.从历史的角度,主要是从边疆地区社会史及国家历史观的角度系统梳理了边疆问题的历史脉络以及过

去历朝各代的边疆政策实践;3.从现实的角度,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生态等多方面,观察边疆地区民族问题的现状,总结有益的地方经验,并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4.跨学科的参与,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已不再局限于民族学,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研究、政治学等学科,都从不同维度呈现这个问题,为边疆问题的学术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带来了新的观点与见解,从而深化了对于边疆民族问题的学术理解与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边疆民族问题研究的引导性作用。

● 专家点评

解读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规律与历代治理边疆的成败得失,阐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并为民族团结提供学理依据,为解决边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凸现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凡此种种,均呼唤着新的边疆研究范式的登场。本年度的边疆民族问题研究既是对边疆现实情势的回应,也是对一些新的研究方法的深化及再开拓。

(点评人:于逢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光明日报

2014 年思想理论领域的热点问题

祝念峰 郑丽平 王雪凌

2014 年我国思想理论领域继续保持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广大理论工作者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研究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等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有力思想舆论支持。同时,围绕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党的建设等领域一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理论界展开了讨论和争论,形成了若干热点。

热点一:关于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了一系列新的战略部署。思想理论界高度关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并围绕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展开热烈讨论。

学者们高度肯定全会及其《决定》的重大意义。全会及其《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强调实现这个总目标,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这清晰勾画了法治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具体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各个领域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一个指导新形势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纲领性文件。

学者们强调,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是

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全会明确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对于这一明确阐述,绝大多数学者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认同。但也有极少数人持质疑或否定态度,诘问“党大还是法大”,把党的领导与法治对立起来,认为强调党的领导就会损害依法治国。对此,学者们分析指出,宪法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但党要带头执行,带头遵守,不存在谁比谁大的问题。诘问“党大还是法大”,其目的是把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对立起来,从而从“法治”问题上打开缺口,进而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必须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讲坚持党的领导,讲我们要搞的是社会主义法治,而绝不能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浑水摸鱼、扰乱视听。

针对有人把“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曲解为西方宪政,认为依法治国就是要实行宪政,学者们分析指出,《决定》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表明我们党对宪法的尊严和权威的充分尊重,是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带头遵守宪法的宪法意识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集中体现。学者们强调,我们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所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它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国家的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确立了国家的国体、政体及基本政治制度,

确立了社会主义法制、民主集中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原则,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反映。西方宪政民主之“宪”,是按照以“三权分立”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宪法来进行统治,用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模式来管理国家,以达到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统治这一根本目的。

学者们建议,在事关大是大非的重大理论观点的解释上,应进一步明确其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引导和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认识。

热点二:关于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10 周年

2014 年 8 月 22 日是邓小平同志诞辰 110 周年纪念日。思想理论界围绕邓小平同志的历史地位和卓越贡献、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及其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与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等问题展开研讨。学者们高度肯定邓小平同志的历史功绩和邓小平理论的开创性意义,大家普遍认为,邓小平同志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不愧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学者们反映,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10 周年的讨论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错误观点或不良倾向。一是完全否定邓小平和邓小平时代。突出表现是在评价改革开放时,只看到发生于改革开放进程之中的负面问题,而不讲成绩。二是割裂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关系,制造“毛、邓对立”。突出表现就是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割裂、对立起来。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以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质疑中国现在搞的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并借此反对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另一种则以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把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妖魔化,把我们党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挫折与失误无限放大,对这一时期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视而不见。三是误读和曲解邓小平理论及其一些重要论断。这些片面、错误理解主要集中在“不争论”“不改革死路一条”“姓‘社’姓‘资’”“警惕右,

但主要是防止‘左’”“共同富裕”等重要论断上。

学者们指出,针对上述不良倾向,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10 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 30 年关系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融会贯通地把握其精神实质。

热点三:关于经济领域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2014 年,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学者们就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全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等问题,继续展开深入研究。

在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学者们认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既要用市场调节去抑制“政府过度干预”,又要用政府调节来纠正“市场机制失灵”,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学者们强调,要深刻认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作用论”与我们党提出的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本质差别,警惕对市场与政府关系进行的各种新自由主义解读。

在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问题上,学者们认为,坚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坚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首先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学者们强调,要高度警惕各种否定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错误观点,比如,有人用市场经济否定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主张全盘私有化。有人把国有经济说成是“官僚垄断资本”,将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正常的市场竞争说成是“与民争利”。有人认为,国有企业只能存在于非竞争领域,不能参与市场竞争和追求更多利润。还有人认为,国有企业只能提供公共物品,从事私有企业不愿意经营的业务,发挥拾遗补缺的作用,等等。

在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问题上,学者们强调,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是实现多种所有制共同发

展的有效制度载体。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前提是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目的是实现“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学者们反映,发展混合所有制作为一项重大的改革措施,目前受到了各方面的普遍关注,成为不少地方启动新一轮国企改革的重要抓手。不过,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盲目性、片面性苗头,需要引起重视。比如,有的地方不分行业属性、企业层级、业务特点,一哄而上,全面开花,搞混合所有制运动;有的地方把发展混合所有制理解为“国退民进”,提出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国有资本比重降得越低越好;还有人提出,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应当以混合所有制为主体而不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等等。学者们认为,这些认识和做法不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不利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需要纠正。

在全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问题上,学者们认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对于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学者们反映,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问题上,还存在一些错误认识。比如,有的人只强调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而不注重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有的人则只强调发展公有制经济,不注重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的人把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对立起来,认为公有制经济发展了就会阻碍和削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了就会阻碍和削弱公有制经济,等等。学者们指出,全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需要辩证地看,既要看比例,更要看总量和控制力。忽视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会落入私有化的陷阱;忽视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就会导致经济体制僵化,经济活力不足。只有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才能确保改革的正确方向。

热点四: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

一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新常态做出了系统阐述,专家学者纷纷对“新常态”作出梳理、解读、

谏言。

学者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概括起来就是“九大趋势”,即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九大趋势性变化;“三更阶段”,即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三转特征”,即经济发展速度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两不变两变”的判断,即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八个更加”的基本导向,即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

学者们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引导全党理性、客观地认识和把握新常态,就是为了统一全党思想,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转换关口,精神上保持平常心,工作上打破惯性思维,增强自觉性,主动作为,走出新路子。当前,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错误论调:有的认为,在经济增速减慢的情况下,只能考虑发展增效,保护和刺激资本的积极性,不能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缩小贫富差距。有的把“新常态”曲解为“经济衰退”,制造“中国经济崩溃论”。有的把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全都归结为新常态,甚至把经济的短期波动也归结为新常态,出现一种把新常态泛化的倾向。还有的把完全市场化当做解决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学者们强调,以增长速度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走到尽头,现在“稳增长”正是“调结构”的发展转机,绝对不能再重走老路。

学者们建议,面对新常态,观念上要适应,认识

上要到位,方法上要对路,工作上要得力。适应新常态的关键在于深化改革开放,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将已经出台的重大经济改革举措落实到位,同时推出既利当前又利长远的高质量改革方案和举措。中央确定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措施,就是为了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要积极顺应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势,加快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和新增长点,突出创新驱动,强化风险防控,加强民生保障,以更有力的改革举措,让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中迈上新台阶、实现新跨越。

热点五: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2014年10月15日,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地位、作用和重大使命,进一步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文艺工作的方向目标、重点任务和基本遵循。

学者们强调,推进文艺的繁荣发展重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文艺创作必须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必须正确处理文艺与市场的关系,文艺既要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又不能为市场所左右。正确处理二者之间关系,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的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真善美作为追求的永恒价值,才不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否则,文艺就会沦为市场的奴隶。

学者们认为,推进文艺工作发展繁荣的关键,在于培养一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工作者。一要培养文艺工作者坚定的人民立场,引导他们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把握人民需求,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文艺作品;二要培养他们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引导他们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挥文艺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的作用,切实承担起引领风

尚、铸造灵魂的神圣使命;三要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引导他们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克服浮躁,潜心创作,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时代要求,推出创意鲜明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文艺作品。

热点六:关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作为一种错误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总是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改头换面,以新的面目出现。2014年,这种思潮在继续虚无近现代中国历史尤其是党史国史的同时,呈现出新的特征。一是污蔑马克思主义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意在从理论上重新阐释历史虚无主义,从而制造思想混乱。二是美化和吹捧中华民国时期的历史。学者们分析认为,一些人重新阐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内涵,把否定和抛弃资产阶级的宪政民主、自由经济制度定义为历史虚无主义,意在夺取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主动权、话语权。其打着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旗帜,间接地隐晦地反对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宣扬资产阶级价值观念,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和欺骗性。而“民国热”则是对中华民国时期的畸形的病态的缅怀,其中既有别有用心之人的刻意引导与挑唆,又有西方反华势力和台独分裂分子的背后影响。必须引导人们正确看待民国,让“缅怀民国”回归理性、客观、真实。

学者们指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打着“揭秘历史”“还原真相”的幌子,肆意解构历史、曲解历史、颠覆历史,违背历史研究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典型表现。比如,近期在甲午战争历史的研究中,出现了否定歪曲丁汝昌、邓世昌、刘步蟾等勇于为国牺牲的海军将领的不良倾向,把丁汝昌等人吞鸦片自杀歪曲为在战争中吸食鸦片。学者们指出,甲午海战中,以邓世昌为代表的北洋海军将士,奋勇杀敌,视死如归,不畏强敌血战到底,有的战死疆场以身殉国,有的拒不投降自杀殉国,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他们是为国牺牲的勇士,其表现可歌可泣。一些人借纪念甲午战争来否定歪曲这些为国牺牲者,实质上是在否定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目的是削弱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

心力,值得高度警惕。

当前,国内不少人深受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蚀,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认识模糊。学者们建议,必须做好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进行长期斗争的准备,坚持用唯物史观揭露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对丑化领袖、歪曲党史国史的言论要敢于交锋,帮助人们澄清思想认识。

热点七:关于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9 周年

2014 年,国家设立抗战胜利纪念日和国家公祭日,高规格纪念抗战胜利和举行国家公祭活动,引起思想理论界的高度关注。学者们围绕抗战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及对当下的警示作用、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等方面展开深入讨论。

学者们高度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讲话中对中国抗战胜利伟大历史意义的新定位,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学者们认为,中国人民在长达 14 年之久的英勇奋战中,付出了重大牺牲,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和平的胜利、人民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和世界各国人民永远值得纪念的胜利。

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在抗战中,中国共产党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英勇奋斗,最大限度团结了全体中国人民奋力抗战,最终取得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历史表明,没有哪种政治力量能像中国共产党那样,领导、组织和凝聚起亿万人民的力量,克服一切困难,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学者们强调,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过程中形成的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对于国家高规格纪念抗战胜利和举行国家公祭活动,绝大多数学者们认为,这是为了不忘历史

教训,振奋民族精神,同时也是为了未来不再发生这样的大屠杀、大悲剧、大惨案,表明中国人民捍卫和平的决心。学者们建议,应进一步加强抗战历史和唯物史观教育,特别是针对青年学生,要进一步引导他们牢记日本帝国主义滔天罪恶和中华民族奋起抗争的历史,并将由此所焕发的爱国主义热情投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之中。

学者们强调,要高度警惕和坚决回击日本右翼右倾势力的不断挑衅。学者们认为,近年来,从炮制南京大屠杀虚构论到掩盖生化武器细菌战,从参拜靖国神社到修改历史教科书,从挑起钓鱼岛争端到修改宪法解禁自卫权,日本极右势力无不在竭力突破二战禁区,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对这种严重挑衅必须高度警惕。学者们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抗战胜利的讲话中强调,中国人民倡导和平,但眼睛里也决容不下沙子。这充分表明了中国的包容胸怀、大国风范和严正立场。

热点八:关于互联网治理

2014 年,在巴西召开的全球互联网治理大会,使长期以来由美国监管的互联网治理的安全性遭到了质疑。我国加强对互联网网站、互联网新闻、互联网新技术应用的管理,特别是 11 月 19 日至 21 日,在浙江乌镇召开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回应了国际社会对网络空间面临重大问题的共同关注。大会以“互联互通共享共治”为主题,鲜明地表达了中国作为互联网大国的国际担当。

在全球网络治理上,习近平总书记 2014 年 7 月份访问巴西时首次提出“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在致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贺词中,再次作了强调。学者们认为,提出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表明了中国参与全球网络治理的负责任的态度。多边、民主、透明的原则使各国开展对话具有了同等基础,有利于增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对话与合作。一些学者认为,在全球互联网治理结构发生变局之际,中国一方面正扭转一味机械应对的被动局面,逐渐以攻为

守,形成积极、自信、主动的态势;另一方面积极探索新的角色,推动全球网络治理从单极向多极发展。有学者指出,中国拥有产业优势、用户优势,但劣势是在架构、规则、平台方面,中国参与互联网全球治理的经验、基础、实力依然薄弱,自主创新相对落后,核心技术也依然受制于人。因此,当务之急要慎重考虑清楚我们的核心利益与核心目标,并积极使之落地。同时,积极推动政府、企业、个人在各种国际场合积极发声、参与讨论。

在国内互联网治理上,学者们认为,网络走进千家万户,正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经济发展方式乃至社会生态体系。法治是互联网治理最重要的硬原则,而道德是柔化的软规则。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是互联网治理的共赢之道。要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完善网络信息服务、网络安全保护、网络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依法治理网络空间,依法规范网络行为。同时,要坚持正确导向,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创新改进网上宣传,加强主流媒体传播公信力、影响力、舆论引导能力建设,高度重视网络斗争,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让网络空间成为激发正能量的坚强阵地。

热点九: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2014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取得了重大成果。思想理论界高度评价党中央从严治党治军、坚决反对腐败的有效举措和出色成绩,同时从加强反腐体制机制建设、遏制途径、惩治手段等方面积极讨论并建言献策。

一是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学者们认为,过去的一年,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风廉政建设不断深入,坚持巩固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持之以恒纠正“四风”,深得党心民心。一年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解决了一些多年想解决但没有解决的问题,刹住了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向全党全国人民交上了一本反“四风”的明白账。

二是关于反腐败斗争。学者们反映,这一年反腐败斗争继续深化,反腐手段不断创新,巡视工作全覆盖、常态化;开展“猎狐2014”专项行动,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力度;严肃查处腐败案件,落马官员在数量上不断刷新纪录。既查处周永康、徐才厚、苏荣、令计划等人严重违纪问题,又查处群众办事难、吃拿卡要、上班时无故脱岗、工作时玩电脑游戏等违反工作纪律的问题,还着手解决部分地方“塌方式腐败”、“小官巨腐”的问题,体现了党中央从严治党治军、坚决反对腐败、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的鲜明态度,以实际行动昭示了反腐不设限、打虎不手软的坚定决心。可以说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前所未有,成效前所未有,腐败蔓延势头得到一定遏制,不仅使党进一步赢得人民群众更坚定的支持和拥护,也使党的组织更为坚强有力,更好地保持了党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三是关于全面从严治党。2014年,是从从严治党原则得到切实贯彻的一年,也是党的建设取得实质性成效的一年。有学者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表明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更加清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总目标,而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大鹏之两翼、战车之两轮,共同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顺利实现。这个过程中,全面从严治党是各项工作顺利推进、各项目标顺利实现的根本保证。有学者提出,“四个全面”更完整地展现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总体框架,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更加清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必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学者们反映,在中央全面推进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过程中,也出现一些值得注意的言论或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第一,“政治斗争论”。认为当前的反腐败斗争是政治斗争、派别斗争甚至政治阴谋。第二,“反腐过头论”。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工作搞得过猛,查得太严了,管得太多了,搞得“为官不易”,甚至“官不聊生”,已

严重影响经济建设,阻碍了改革发展。第三,“反腐亡党论”。针对当前一些地方出现的“塌方式腐败”,说什么“不反腐败要亡党,真反腐败也要亡党”。第四,“反腐无用论”。认为现在“无官不贪”,反腐再厉害也只不过是反掉冰山一角,“无论如何反腐,其结局都必定是越反越腐败”。学者们建议,面对反腐败斗争中出现的种种似是而非的错误观点,一方面要保持政治定力,继续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沉的使命忧患感、顽强的意志品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无禁区、全覆

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腐败分子,着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另一方面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及时坚决地回击各种错误言论和观点,用客观事实和科学论证,揭示其虚伪性和挑唆性。唯有如此,才能唱响主旋律,凝聚精气神,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推向前进。

(作者单位: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来源:《红旗文稿》